



Bernstein Duben

伯恩斯坦读本

殷叙彝 编

爱·伯恩斯坦（1850～1932）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著名活动家，曾经信奉马克思主义并且得到恩格斯的赞赏。19世纪以来，他根据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策略力和发展趋势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哲学思想和经济学说发生怀疑，发表文章提出反对意见，并且主张社会民主党应当放弃暴力革命思想，成为民主的社会改良政党。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伯恩施坦读本

殷叙彝 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伯恩施坦读本/殷叙彝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5

(人文悦读)

ISBN 978-7-80109-798-9

I. 伯… II. 殷… III. 伯恩施坦, E. (1850~1932) —文集 IV. D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4694 号

伯恩施坦读本

出版人:和 龔

责任编辑:邢艳琦

责任印制:尹 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010)66509360 66509236(编辑部)

(010)66509364(发行部) 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450 千字

印 张:38.25

版 次:200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6.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伯恩施坦的生平和思想发展过程

(序言)

殷叙彝

大致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欧洲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纷纷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政党,并且在1889年建立了联合组织即第二国际。当时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和平发展时期,各国社会党主要从事合法的议会斗争和工会工作,但在理论上仍旧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革命观点,即工人阶级将利用资本主义的严重经济和政治危机举行(多半是暴力的)革命取得政权,把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但正是在这一阶段,党和工会的许多干部日益满足于日常合法斗争的成就,忽视了实现社会主义这一最终目的,也有些理论工作者认为应当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减缓和克服危机的调节能力重新作出评价,认真考虑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内部逐步提高经济和政治地位、争得民主并最后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现实可能性。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理论家爱德华·伯恩施坦就是一个代表。他从批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开始,发展到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认为只有通过批判马克思主义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前进。他的思想理论体系在社会主义运动内部被称为修正主义,并且受到党内正统派和革命左派的严厉批判,却为实践中的改良主义提供了论据,而且迄今一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党内保持它的影响,因此目前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本书选材的内容,这篇前言将对伯恩施坦

的生平和思想发展过程作一个概括的评介。

伯恩斯坦于1850年出生在一个犹太血统的德国人家庭。父亲起初是白铁匠,后来做了火车司机。伯父阿隆·伯恩斯坦是著名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由于家境困难,1866年伯恩斯坦进银行做学徒,那时他中学还未毕业。四年学徒期满后,他进入柏林的一家银行当职员,从1871年直到1878年。

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比英国和法国晚,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兴起时,英、法已产生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因此德国的一部分激进民主主义者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但是他们一方面相当长一段时间不能分清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的实质,另一方面在思想深处仍旧信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伯恩斯坦当时就是这样的。他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期间受到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英勇的反战斗争的影响,参加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72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

那时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分成两派,一派是拉萨尔影响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一派是接受第一国际原则的爱森纳赫派即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伯恩斯坦虽然参加了爱森纳赫派,接受了《共产党宣言》的一般结论,但是还分不清马克思主义和拉萨尔主义的根本区别,而且对柏林大学私人讲师欧根·杜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很欣赏,甚至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可以同时容纳下一个马克思和一个杜林。”^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那时是一个“社会主义的

^① 伯恩斯坦《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5页。

折中主义者”。^①他还受到主张伦理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员卡尔·赫希伯格的影响。赫希伯格是银行家的儿子,乐于出资帮助党创办刊物,但主要是宣传社会改良主义思想。1878年9月,伯恩施坦接受赫希伯格的邀请,辞去银行的职务,随他到瑞士,担任他的私人著作秘书。

1878年10月,俾斯麦反动政府颁布了镇压社会主义运动的“反社会党人法”,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和报刊都遭到查禁,党除了由党员参加议会选举和议会活动外,不能从事任何合法活动,许多领导人和活动家被迫流亡国外。党的领导考虑在瑞士出版一家周报(即《社会民主党人报》),秘密向国内运送和散布。伯恩施坦曾和赫希伯格等人一同受党的委托筹备创办该报,但是由于他对办报方针的意见引起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满,他又部分地参与了宣扬改良和妥协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的写作(主要作者为赫希伯格等),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严厉批判,因此,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出版时,他只参加管理委员会的工作。在这以后,他阅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比较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策略问题上也纠正了上述文章中的一些错误观点。1880年2月,倍倍尔带他到伦敦拜访马克思和恩格斯,使他获得两位老人的信任,特别是从此与恩格斯建立了通信关系。1881年1月,伯恩施坦应倍倍尔邀请临时代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由于他所编辑的5期报纸受到恩格斯的称赞,倍倍尔建议由他正式担任这一工作,他同意了,从此一直编辑到1890年报停刊为止。

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称赞该报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以下简称《伯恩施坦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64页。

“无疑是党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报纸”，“在它的篇幅上极其明确地和坚决地阐述并捍卫了党的原则，编辑部的策略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正确的”。^①这一光辉成就就要归功于多方面的因素，包括恩格斯和倍倍尔的原则指导、考茨基等人的撰稿等等，但是长期主持编辑工作的伯恩施坦的功绩无疑是巨大的。正如倍倍尔所说的，那一时期是伯恩施坦的“辉煌年代”。他正是通过这一阶段的工作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伯恩施坦在 500 多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不少篇署名和不署名的社论和文章，主要贡献在两个方面。第一，揭露和批评俾斯麦政府的反动政策，并批判为这些政策提供论证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第二，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批判 1875 年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后党内残存的拉萨尔主义思想，例如“由国家贷款成立合作社来解决社会问题”、“自由人民国家”、“社会王国”等观点，批判的核心是国家理论。伯恩施坦援引《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书中的理论，指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机关，是统治阶级的管理委员会，无产阶级只有“夺取国家中的权力”才能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只有在社会主义共和国中才能实现”等等。《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伯恩施坦所写和别人的有关文章基本上清算了德国社会民主党 1875 年哥达纲领中的拉萨尔主义观点，为 1891 年制定新的纲领即爱尔福特纲领作了准备。伯恩施坦本人后来也是这一著名纲领的第二部分的起草人。^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 版第 22 卷，第 89—90 页。

② 关于伯恩施坦在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时期的情况，可参看拙作《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署名“许力夫”），载于《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 6 辑，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但是伯恩施坦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特别是在后期发表的文章中已开始暴露出他的修正主义思想的萌芽,这主要也是表现在国家问题上。伯恩施坦对有严重封建残余的德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加以抨击,强调共和国同波拿巴警察国家相比是一大进步,但是他未能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中的历史地位的高度来分析这一问题,而是抽象地把君主制和共和制对立起来,强调“共和制是通向真理的道路”等等,而且把共和国中对人民权利和政治自由的侵犯主要归咎于封建专制的残余影响和人民还不懂得使用民主,甚至说,“在君主国中,人民缺乏获得面包的自由,在共和国中,如果自由也不能使人民获得面包,那过错在于人民”。与这种对共和国的理想化相联系的是他对议会制的理想化。1890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取得空前胜利,俾斯麦下台了,反社会党人法即将废除,社会民主党面临着恢复合法地位后的重大策略转变。伯恩施坦为此发表了《暗礁》(或译《悬崖》)和《略谈策略问题》两文^①,在正确论证党应当重视议会工作的同时,片面地强调“通向彻底的、完全的政治自由的道路是经过议会政治的,而不是绕过议会政治的”;认为当工人阶级运动加强,成为“人民运动”以后,它就要使自己的要求成为立即可以实现的。也就是说,它即使不把“最终目的”完全放到次要地位,但在确定通向最终目的的道路时也要考虑到实际的情况。1890年9月6日,他又在一篇社论《关于党内问题》(Ⅲ)中说:“我们不劝告工人为未来而牺牲自己的现在,为了追赶鸽子而把手中的麻雀放掉,而是说,麻雀和鸽子都要。这是工人阶级能理解的政策,任何另一种政策他们都会置之不理。”这些观点说明,至少就德国当时的具体状况而言,伯

^① 这一读本所收的《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地位》就是伯恩施坦把这两篇文章删节合并而成的。

恩施坦对议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估计过高。他尽管没有反对追赶“鸽子”即最终目的,但是显然已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眼前的“麻雀”上了。从这里已可看出他后来提出的关于最终目的和运动的关系的著名论断的萌芽。因此,伯恩施坦说自己的修正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是符合实际的。

二

1888年4月,瑞士政府在德国的压力下,将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人报》其他负责人驱逐出境。伯恩施坦于5月12日来到伦敦,报纸也于9月迁到伦敦继续出版,到1890年9月停刊。伯恩施坦在伦敦一直居留到1901年。在这期间,他担任考茨基主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的常任撰稿人,和恩格斯以及艾威林夫妇(爱德华·艾威林和爱琳娜·马克思)过从甚密,并且被恩格斯指定为他的遗嘱执行人之一。

自从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以后,社会民主党在德国获得了充分开展合法活动的权利,党的组织和报刊,党的议会活动以及工会组织都有很大的发展。不仅如此,在英国的十几年使伯恩施坦能亲自观察和体会英国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且和许多著名的费边社会主义者如维伯夫妇、肖伯纳交往。这一切都对伯恩施坦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他的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日益滋长,另一方面,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也产生一些看法。因此他的修正主义思想逐渐形成体系,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开始系统地发表出来。

论述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著作通常把1896—1898年伯恩施坦在《新时代》上发表《社会主义问题》这组文章当作他宣扬修正主义的起点,却忽略了他的另一篇重要著作,也

就是他为瑞士社会主义者路易·埃里梯尔《1848年法国革命史》德文译本(1897年出版)所写的后记。伯恩施坦是译者之一,他在这篇题为《从第二帝国到第三共和国》的后记的第一节《第二共和国是怎样崩溃的》以及对该书正文的一些评注中发表了不少与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针锋相对的观点,实际上已经相当完整地表述了他关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应当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观点。

1848年2月的法国革命就其性质来说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二月街垒战推翻了七月王朝,无产阶级又迫使临时政府宣布实行共和制并且作出一系列让步:普选权、出版和集会自由、缩短工时等等。但是无产阶级的一些要求实际上已超出当时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程度和资产阶级统治所允许的范围,只可能是空想、幻想。从资产阶级方面来说,为了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必须至少部分地摆脱上述那些让步,反对无产阶级的要求,而这只有动用武器才能做到。为此临时政府和后来的制宪议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用了许多阴谋和挑衅手段,迫使无产阶级在缺乏思想和物质准备的情况下举行起义。因此,六月起义的失败是必然的。马克思认为,正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巩固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彻底展开以及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当然,他当时对资产阶级统治崩溃和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前景的估计仍是过分乐观的,后来他和恩格斯都承认了这一点。尽管如此,《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对革命的经济和政治背景、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斗争的客观分析以及对反动派的揭露和批判、对革命派的歌颂,在今天读来仍旧是大有启发和教益的。与此对比,伯恩施坦的后记和评注虽然也是从对经济关系的分析出发的,最后却成了为起义镇压者的辩护。

伯恩施坦认为,在法国当时的条件下,二月共和国及其政府是

理想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和政府,在其中“政治特权的基座已被摧毁”,现在是“由全体人民,不分财产和生活地位的差别,决定立法的方针和性质了”,“随着出版和集会自由的给予和普选权的宣布,已经在原则上宣告了无产阶级的解放”,^①关键只在于无产阶级是否有能力使这一原则付诸实现。这就是说,既然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当时唯一可能的国家形式,工人阶级就应当帮助资产阶级民主派巩固这个共和国,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通过以普选权为主的合法手段逐步争取改良。任何企图用革命手段如示威和罢工迫使资产阶级作出让步的行动都是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至于武装起义,那就是更加有害的了。伯恩施坦否认法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客观存在的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忽视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蓄意挑拨和镇压起义的准备,夸大革命俱乐部的错误,认为六月起义不是严肃的阶级斗争,而是本应避免的不幸。它打乱了共和国和平发展的正常过程,成了社会的灾难。因此,为了维护共和国,镇压起义是绝对必要的。承认了这一前提,对刽子手卡芬雅克将军的措施和行为就只能从军事角度来判断了。伯恩施坦引用官方材料说明起义者牺牲的人数不像革命派所说的那么多,镇压者方面也死了不少人,尤其是不要“把从街垒打出的每一枪都看成是英雄行为,把朝街垒打出的每一枪都看成是谋杀罪行。”^②由此可见,伯恩施坦实际上是接受了资产阶级的“六月革命侵犯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该万死!”的逻辑。因此,尽管他的后记和评注中也有一些正确的分析和评论,但他的基本立场是错误的。这是他在上引《社会民主党人报》文章中表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崇拜思想的发展。他认为只有反对封建专制时暴力才是必需

① 本书第 99 页。

② 本书第 127 页。

的,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暴力不仅没有必要,而且绝对有害。他完全忽视了是否发生暴力革命并不完全取决于无产阶级,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这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也不例外。伯恩施坦关于1848年法国革命的评价正是他的这种错误思想的表现。

从1896年到1898年,伯恩施坦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在《新时代》上发表了6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提出批评,主要观点表现在《空想主义和折中主义》、《社会主义中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两文中。在这期间,他还在《新时代》上发表《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和社会革命》一文,其第2节《崩溃论和政策》中也发表了不少修正主义观点。^① 他的这些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巨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使无产阶级能作为自觉的革命阶级掌握政权,按社会主义方向实行社会的全面改造。伯恩施坦怀疑乃至否认这种可能性,认为卡特尔和托拉斯未必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包含着“未来剧烈得多的危机的胚芽”,而现代信用制度的灵活性、交通和通讯的完善化、商业统计和情报机构的改进、工业家组织的扩展都会对生产活动与市场状况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很有可能将来不会发生过去那种能成为社会变革前奏的营业危机。

第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已能运用民主

^① 1900年伯恩施坦编辑出版了他的论文集《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其中的第二辑就是《社会主义问题》。但是他删去了原来属于这一组文章中的两篇,收入《崩溃论和殖民政策》和另一篇文章,显然是认为这样更能全面反映他的修正主义观点。后来人们提到《社会主义问题》时一般是指收入这一文集的六篇文章。

对国家和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施加影响,并且按民主精神修改企业领导的决策,使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公共利益。另一方面,某些生产部门已成熟到这样的程度,不适于听任它们被私人用来进行剥削,因此工人政党不能把一切都推迟到资本主义飞跃到社会主义以后才做,不能划清“这边是资本主义,那边是社会主义”的界限,而是可以考虑“社会的长入社会主义”。伯恩施坦认为,虽然共产主义社会还相当遥远,但是他相信“**现在这一代人已经会看到许多的社会主义得到实现**”,例如社会义务的范围不断扩大,社会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监督权的扩展,地方自治团体的建立及其职能的扩大,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一部分的实现。伴随着这一发展,经济企业自然会从私人管理转入公共管理,但是这种管理只能逐渐地进行”。^①

第三,认为新康德主义者所提“回到康德去”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适用的。这就是说,要承认一切唯物主义都是有条件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承认一些观念的力量或“空论”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正当原动力,特别是道德意识或法权观点,而阶级的利益也具有社会的或伦理的因素,在相当程度上不仅是**理智上的利益**,而且是**道德上的利益**,因而它也固有一种道德意义的观念性。总之,关于未来发展的全部理论,即使是十分唯物主义的,归根到底也一定带有空论的色彩。道德观等等尽管只存在于人的头脑中,也是**绝对实在的东西**,是一个**能起创造作用的力量**。“因此凡是不梦想突然一跃就到了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就不会把**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的继续发展**看成和经济改革的实现一样仅仅是属于未来的事情”。^②

① 本书第155页。

② 本书第195页。

第四,伯恩施坦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作出了一个著名的声明:“我坦白说,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①

综上所述,伯恩施坦当时已形成这样的思想:在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并且具备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实际上也就是欧洲大多数国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已是可能的。用他自己总结党内对他的批评意见的话来说:“从我的论文得出的实践上的结论是,放弃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尽管他本人认为这是一个“武断的结论”)。^②

《社会主义问题》这组文章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引起强烈的反应,不少党员表示反对他的观点,并且要求即将于1898年10月在斯图加特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对此表示态度。党的领袖倍倍尔和主要理论家考茨基也对他的议论感到不安,但还不认为十分严重,因此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并未把伯恩施坦问题单独列入议程,只是在讨论党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时围绕“运动和最终目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德国政府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发出的通缉伯恩施坦的命令还未撤销,他不能回国参加大会,只是寄去了一份书面声明,由倍倍尔代为宣读。他在声明中表示不愿放弃那组文章所表述的他的信念的任何主要方面。他认为《共产党宣言》对于现代社会发展所作的预断只是就一般趋势来说是正确的,但是许多具体结论、首先是对于发展所需时间的估计是错误的,因此“发展所采取的形式和它将达到的形态,也必然是《共产党宣言》所没有预见

① 本书第155页。

② 本书第198页。

到而且也不可能预见到的”^①。他声称反对这样的见解：“我们面临指日可待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社会民主党**应当根据对这种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灾变的指望来确定自己的策略或使自己的策略以它为转移。**”^②他也对自己关于目的和运动的那句话作了解释，说“它不可能是表示对社会主义原则的最终实现漠不关心，而只是对事情将采取‘什么样’的最后形态漠不关心，或者也许不如说**不加操心**”。^③他认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剥夺资本家这些事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党内对于这一手段并不存在争论，问题只是在于这些手段实现时的情况，这是丝毫不能预言的。在斯图加特大会上，沃尔夫冈·海涅支持伯恩施坦关于最终目的的说法，但是卢森堡和蔡特金强调应把最终目的理解为“在建立一个未来社会之前必须先解决的问题，即夺取政权”。^④伯恩施坦在后来的著作中还一再为自己辩解，但是他的全部议论证明，他和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分歧正是在于是否必须通过革命夺取政权，而不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

正是在这篇声明中，伯恩施坦第一次援引1895年恩格斯为《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新版所写导言中的一些论点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并且说恩格斯也已认为有必要对以灾变为顶点的策略“**作出修正**”。1899年4月，卢森堡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中开始把伯恩施坦的理论称为“修正主义”。此后在批判伯恩施坦的文章中，“修正主义”一词逐渐与“机会主义”并用，但是直到1903年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才在党的正式决议（“关于党的策

① 本书第198页。

② 同上。

③ 本书第202页。

④ 《伯恩施坦争论》第27页，并参看33—38页。

略问题的决议”)中谴责“修正主义的策略”。

三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以后,考茨基和奥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建议伯恩施坦写一本书来系统地说明自己的观点,倍倍尔也赞成。于是伯恩施坦在1899年1月写成《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以下简称《前提》)一书,于3月出版。

《前提》共分5章。第一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批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主要针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暴力革命策略。第三章《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着眼于“危机和现代经济的适应能力”。第四章《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和能力》除了阐述对一些具体政策的主张外,重点在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第五章(原文称为“末章”)“最终目的和运动”的内容超出标题所表明的范围,着重批评教条主义,鼓吹修正主义。此书1902年、1908年再版时,作者都写了序言。他还为1900年出版的法文译本(书名改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和1909年出版的英文节译本(书名改为《进化的社会主义》)写了序言。这些序言或短或长,但都对书中的观点作了进一步阐述,而1908年版序言末尾的一句话对我们理解此书的内容很有启发,这就是:“我们必须预计到现存社会制度有比过去所假定的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弹性,并且按照这一预计来展开我们的斗争实践。这一思想正是本书的全部精髓所在。”^①

伯恩施坦在给斯图加特大会寄去的《声明》中批评《共产党宣

^① 本书第429页。

言》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预断有两方面的错误。第一,社会关系的尖锐化没有实现。随着社会财富的增殖,各种等级的资本家不断增加,中等阶层增加了。第二,工业生产中的积聚在许多部门中并没有达到《宣言》所说的那种程度。伯恩施坦在《前提》第三章中引用大量统计材料来论证这些批评。倍倍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上批判伯恩施坦的长篇发言中也引用大量统计材料来反驳他。双方都承认对方的数字是有根据的,分歧主要在于分析的方法和结论。伯恩施坦关于资本积累的速度和程度的观点尽管有一定道理,但涉及的只是对发展所需“时间”的估计,不是本质问题。要根据这些数字来推翻马克思关于资本积聚和集中趋势的理论还谈不上。但是伯恩施坦关于中等阶层和中等企业没有消失、社会关系的尖锐化没有像《宣言》所说的那样实现的论断却很值得重视。这大体上符合19世纪末德国和另一些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在第二国际各社会党中被当作纲领的样板)的原则部分对资本主义社会崩溃必然性的论述过分简单化和绝对化。例如说“小经营日趋没落”,“分散的小经营日益为大规模的经营所排挤”,无产阶级和中间阶层(小资产者和农民)的“生活不安定、贫困、压迫、奴役、屈辱、剥削有增无已”,“无产阶级的人数越来越增大,过剩劳动者队伍越来越增多,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对立越来越尖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这种阶级斗争使现代社会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而成为一切工业国家的共同标志,这一鸿沟还由于危机而加宽:“危机的范围越来越广,破坏性越来越大,使普遍的不安定成为社会的正常状态,并证明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为今天的社会所不能控制的地步,生产资料的私有已经和这种生产资料的合